

两宋诗三百首

黄瑞云 选注



中州古籍出版社

前 言

一、宋初诗坛，从王禹偁到西昆体

光焰万丈的唐诗随着李唐王朝的衰亡也终于唱到了尽头，残唐五代诗坛萎弱，再也听不到开元天宝至元和长庆间那种高亢的声音了。后周显德七年，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轻易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用十几年的时间，收拾了分裂割据的局面，没有经过多少激烈的战斗，就马马虎虎地组建了一个中国历史上继汉唐以后较为久长的王朝。诗坛的复苏可没有那么简易。北宋初期的诗歌，从宋太祖开国（960），中历太宗真宗两朝，一直在一条曲折的小径上徘徊。到仁宗天圣八年（1030）以后，宋诗才开始繁荣，时间花费了整整70年。

宋初有一群诗人，上承晚唐诗风，格局狭小，气韵低沉，像大潮之后，一个又一个的洪涛已经过去，只有馀波还在荡漾。徐铉、杨徽之、王周、柳开、魏野、潘阆等人，算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了，间或有几首小诗清新可诵。还有所谓九僧者，也曾成一小小的气候。他们的集子在当时就不很流传，其成就也就微不足道^①。直到王禹偁出来，诗坛才稍有起色。

王禹偁主要活动于太宗时代。他对当时诗道萎靡的状况深为不满，尝谓“可怜诗道日已替，风骚委地何人收！”^②感叹中也不无自许之意。他在《赠朱严》诗中说：“谁怜所好还同我，韩柳文章李杜诗。”诗文都是正宗学唐的。论诗风，他同李白关系不大，而是着意追踪杜甫和白居易，尤其是后者。他自称“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王诗清顺明畅，对劳运人民也较为关切，这些都和白居易相近。他学习民歌写的《畚田调》，明显地可以看到白居易和刘禹锡的影响。王禹偁在宋代首开风气，他的诗作也只是唐诗的余波，而为宋诗的序幕。

王禹偁于宋真宗咸平四年去世，其时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等人还没有出生，而西昆的主角杨亿、刘筠、钱惟演相继进入馆阁，他们扇起的西昆体风靡一时，宋诗的繁荣还要走一段崎岖的道路。

宋真宗时翰林学士户部郎中知制诰杨亿，将他和刘筠、钱惟演等 17 人唱和的近体诗编成《西昆酬唱集》^③。诗仅 284 首，其中 4/5 为杨刘钱三人所作。这些人全是馆阁要员，影响很大，所以他们能雄踞诗坛，势倾朝野。西昆诗题材内容狭窄，大多歌咏历史故事，抒写夜直宴游，以及模仿李商隐的无题有感之类。他们师法的路子很窄，只把李商隐作为崇奉的偶像，窃取李商隐的词汇，仿造李商隐的句式。《古今诗话》记述了一个有趣的笑话：西昆诗人“多窃取义山语。尝御赐百官宴，优人有装李义山者，衣服败裂，告人曰：‘我为诸馆职捋扯到此！’闻者大噱。”其实他们只得李商隐

的皮毛，并未得李商隐的真髓。李商隐有大量清畅明净之作，并不都艰涩隐晦。即使他的艰涩隐晦的作品，内容也是充实的。而西昆之作大多恒钉词汇，堆砌典故，而内容空泛，往往反复唱酬，有同游戏。即使是他们的内容较为实在的作品，也都艰深拗涩，缺乏诗味。《瀛奎律髓》卷三有纪昀评云：“昆体宗法义山，其实义山别有立命安身之处，杨刘但则其字句耳。”这评论是正确的。

论者以北宋的西昆体有类初唐的宫廷诗，其实两者极不相同。初唐宫廷诗用华丽的篇章，为统治者歌功颂德，内容固不足多取。但他们锻炼了诗的体裁，促进了律诗的成熟；而西昆没有这种作用。初唐宫廷诗明白晓畅，昆体却晦涩格讷。特别是初唐宫廷诗后期的代表人物杜审言、宋之问、沈佺期等人，当他们被迫离开宫廷以后，都写出了脍炙人口的优秀诗篇；西昆诗人即使离开馆阁写的作品算得上好诗的也实在寥寥。当然，存在总有某种合理性，西昆体谨严典雅的风格，对于结束晚唐诗的浮浅，具有一定的整饬作用。

就在西昆昌炽之日，也有不少有识之士起来反对，穆修尹洙石介等人就是西昆激烈的批评者。石介在《怪说》一文中说：“今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剗镞圣人之经，离析圣人之言，螫伤圣人之道。”抨击是激烈而尖锐的。但他们是散文家，而且成就不算太大。他们搬出“圣人”来对付西昆也不解决问题。在当时的诗坛上，也有一些作者是不向昆风靡伏的，林逋就是代表性的人物。当杨亿等馆阁唱酬之日，林和靖却以清新朴实的语言，淡远

遒美的风格，在杭州美丽的湖山胜境，独辟自己的林苑。这是一个北宋的隐逸诗人，一个北宋的王绩。他以咏梅佳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闻名。只是他这些好句，并没有凑足完篇，集中完美的作品实在太少，其影响也就十分有限。

不过我们不用着急，西昆的浓雾毕竟不是太大，杨亿刘筠等人一个个垂垂老矣，年青的欧阳修正从江西风尘北上，有宋一代繁花似锦的诗苑阳春即将来到。

二、隆宋，欧王苏黄时代

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是北宋文苑具有分界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欧阳修 24 岁，进士及第。没过多久，刘筠去世。四年之后（1034），欧阳修召试学士院，同年，钱惟演去世。这些事件，象征性地标志着两个时期的交接。自天圣八年开始，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代，下至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苏门四学士的最后一名张耒下世，前后凡 85 年，是北宋诗坛的鼎盛时期。不独诗也，也是宋文宋词最辉煌的时代。这个时期拥有北宋四大诗人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和黄庭坚。四大诗人中欧阳修长王安石 14 岁，王安石早苏轼 16 岁，苏轼大 黄庭坚 8 岁，大体上是四个阶梯。不过四个阶梯中，欧阳修处于宗师的地位，其他三位都是他的后辈，诗歌活动也正可以分为前后两段：前 30 多年欧阳修盟主文坛，后 40 年苏东坡率领他的大军纵横驰骋。

欧王苏黄时代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是辉煌的，只有盛

唐超过了它，中唐则差可比拟，除此没有别的时代可以与之相埒。

欧阳修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早年支持范仲淹庆历新政，晚年与王安石政见相左，以太子少师致仕。宋仁宗英宗朝为宋代社会相对稳定之时，值文运复苏之世，欧阳修以其超逸的才华，崇高的地位，特别是卓越的创作实绩，成为当时的文坛领袖，散文诗词均成为有宋第一代大家。欧阳修学识渊博，于前人兼收并蓄，尤得力于韩愈。他一上文坛，即高张韩愈的旗帜，对西昆进行扫荡。他在《记旧本韩文后》一文中，说他年少时得唐《昌黎先生文集》，见其言深厚而雄博，但未能悉究其义，徒见其浩然无涯若可爱。后面接着说：

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予亦方举进士，以礼部诗赋为事。年十有七，试于州，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韩氏之文复阅之，则喟然叹曰：学者当至于是而止尔！因怪时人之不道，而顾己亦未暇学，徒时时独念于予心：以谓方从进士干禄以养亲，苟得禄矣，当尽力于斯文，以偿其素志。后七年，举进士及第，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补缀之，求人家所有旧本而校定之。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而韩文遂行于世。至于今，盖三十余年矣，学者非韩不学也，可谓盛矣。

从这一段叙述可以看出欧阳修对韩愈的倾倒，并交了自己的渊源所自，从中也可以看到韩愈对宋人的巨大影响。

欧阳修文章得力于韩愈如此之深，然风格迥异于韩愈。韩文汪洋恣肆，气势磅礴；欧文舒徐婉转，而气骨自浑涵于其中。欧阳修的诗数腴温润，自然流丽。苏轼谓其诗似李白^④，其实亦得力于韩愈者多，然变韩愈之劲健而为平易，其以文为诗则愈亦过之，开隆宋一代风气。古人评论似少有注意及此，惟刘熙载《艺概》云：“东坡谓欧阳公论大道似韩愈，诗赋似李白。然试以欧诗观之，其刻意形容处，实于韩愈为逼近耳。”刘氏之说，可谓独具只眼。

在欧阳修周围有一大群诗人，其中梅尧臣苏舜钦更为杰出。由于欧阳修极力推崇苏梅二子，甚至说他们“视我犹后辈”，加以苏梅都过早去世，以至许多评论家都把他们作为欧阳修的先导。清叶燮说“开宋诗一代之面目者，始于梅尧臣苏舜钦二人。”宋莘说他们“挽杨刘之颓波，导欧苏之前驱^⑤。”其实欧阳修与二人同时，而且成名比他们都早。梅尧臣苏舜钦是欧阳修的羽翼而不是他的前驱，甚至他们的得名当世正是欧阳修激扬的结果。

梅尧臣苏舜钦于扫昆体之积弊，主张明道致用，似较欧阳修更为激烈。梅尧臣抨击当时诗风，有道是“迩来道颇丧，有作皆言空。烟云写形象，葩卉咏青红。人事极谀谄，引古称辩雄。经营惟切偶，荣利因被蒙。遂使世上人，只曰一艺充。”他自己的创作则明确提出要以雅颂美刺作为楷模^⑥。苏舜钦则认为诗应“警时鼓众”，“致于用而已”^⑦。梅苏诗内容自不如欧阳修广阔，但亦有他们独特的方面。梅尧臣有较多关心民瘼的作品，《田家》《小村》之类的诗作，写得

真实而有感情。苏舜钦关注国防边事的作品，在北宋较为突出。《庆州败》一类的诗，对于边防虚弱，军将无能，致使国家蒙受耻辱，愤激之情，溢于言表。他在《吾闻》诗中写到自己，“予生虽儒家，气欲吞逆虏。斯时不见用，感叹肠胃热。昼卧书册中，梦过玉关北。”这是北宋一代难以听到的声音。欧阳修在他的《诗话》中对梅苏二家诗的风格有简捷的评论：“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梅尧臣诗追求闲远平淡，其佳作确能给人一种自然幽趣。他曾说：“诗家虽率意遣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⑧”。这实在是千古名言，但他自己也未能做到。平淡必须是语言平易而内蕴深厚，而绝不是平庸枯淡，可惜梅都官恰好有许多平庸枯淡之作。苏舜钦诗英雄奔放，他个性刚烈，创作也就是发其愤懑于歌诗。但不少作品粗犷率露，而且散文化的倾向非常严重，有些诗句简直就是将散文硬压成五七言句子，因而生硬别扭，缺乏诗味。他们的成就远不如稍后的王安石。

王安石是杰出的政治家，在神宗朝两任宰相，主持了历史上著名的变法改革。他是散文大师，文章以议论见长，具有政治家的谨严和深刻。其诗名为文名所掩，其实王安石的诗也是北宋一大家。王安石的七古名篇，很少有纯粹的抒情写景之作，大多楔入精辟的议论。由于他见解独到，蕴涵深厚，因而并不枯燥。两首《明妃曲》就因为惊世骇俗的议

论，成为一宗诗坛公案，争论历千年而不辍。或者加以挹伐，或者为之回护，其实都无必要，只是因为他的见解不同凡响而已。他的近体诗有许多名作。律诗属对工整，律度精严，颇得力于杜甫。特别是他的七言绝句，更独树一帜，以大手笔写小诗，格调高远，或咏叹占昔而独具诗人卓见，或模写自然而自见作者胸襟。严羽《沧浪诗话》称：“公绝句最高，其得意处高出苏黄之上。”严羽这话是有分寸的，“高出苏黄之上”的是“其得意处”。就七绝的总的成就论，东坡还是可与比肩的。只是两家风格不同，东坡清雄而安石沈郁。叶梦得《石林诗话》云：“安石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从宋次道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悟深婉不迫之趣。”诗风的改变并不全是读书的结果，但这段话说到安石前后期风格的不同是符合实际的。

由于苏轼杰出的才华和活力，加以神宗朝许多著名的诗人政治上大多与王安石相左，苏轼也就自然地成了文坛的领袖。嘉祐二年（1057）苏轼一试礼部即为欧阳修所赏识而名动京师。在40多年宦宦和创作生涯中，他的起落几乎牵动天下人的心。历史上赢得这样地位的诗人是极少的。他极有才华，《宋史》本传谓东坡尝自言“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因而嘻笑怒骂皆可以书而诵之。《春渚纪闻》亦记载他说，“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这大概确实是他的真实感受。苏轼的诗文词赋都在宋代首屈一指。诗可称第一大家，文与欧阳修王

安石鼎足，词为豪放派大师，与南宋辛弃疾并称“苏辛”，赋作他人少有其比。其作品无不汪洋恣肆，驰骋自如。他的诗歌，题材内容最为广阔，而有统一的清雄奔放的风格，具有李太白的豪纵，白居易的平易。和许多诗人一样，东坡的佳作多是奔走道路上写的，而在斥逐贬谪时更写了许多卓越的作品。宋朝人在陈述国家大政时用儒家，而对险恶的官场倾轧、坎坷的人生遭际就走入道家或禅学，这在东坡身上最为突出。道家的旷达，禅学的机锋，和诗人个性的豪放，结合在一起，就凝成了东坡作品特有的风格。东坡诗诸体兼备，七古七律七绝尤多名作。晚年花了很大功夫来钻研陶渊明，“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但和陶之作未必是他诗作中成功的部分。王十朋注苏诗序云：“东坡先生之英才绝识，卓绝一世。平生斟酌经诗，贯穿子史，下至小说杂记，佛道经书，古诗方言，莫不毕究，故虽天地之造化，古今之兴替，风俗之消长，与夫山川草木禽兽鳞介昆虫之属，亦皆洞其机而贯其妙，积而为胸中之文，不啻如长江大河，汪洋閎肆，变化万状。则凡波澜于一吟一咏之间者，讵可以一二人之学而窥其涯哉！”这评价自然到了顶。但东坡亦有不少草率之作，奔放有馀而凝炼不足，有些甚至流于浮滑，使事信手拈来，亦有不尽恰当之处。正因为这些出自东坡，影响也就更加不好。

在苏门四学士中，黄庭坚的成就越过了其他学士而与东坡并驾，称为“苏黄”。然而黄庭坚没有苏东坡幸运，他是历史上大诗人中争议最多的一个。推崇者把他尊到了祖师的地

位，斥责者说他是“剽窃之黠者”（王若虚语），否定得一文不值，有些文学史提到他仅仅是为了批判他。然而，单是争议如此之大，就说明他非同小可。平心论之，黄山谷不失为自成一家的诗人，他出入苏门，却不受苏诗的笼罩。他心仪杜甫，却仍具自己的面目。山谷创作严谨，感情真挚，作诗讲究章法句法，篇篇经过认真的锤炼。读东坡诗要放声歌唱，读山谷诗须慢慢品味。他的七古长篇，结构都很讲究。七言律诗可与王安石相比，但他的对仗更为奇崛。“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黄流不解浣明月，绿树为我生清秋”，一联之间上下两句，往往造出两个相距甚远的境界，而都美不胜收。论者们一提到黄庭坚，立即抓住他说过的“无一字无来处”，“点铁成金”，“脱胎换骨”大做文章^⑨，好像这是山谷诗法的全部内容，而且是他赦不了的罪过。“无一字无来处”，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事实上也不可能，山谷诗也并非如此。至于“点铁成金”，“脱胎换骨”，也无需抓住不放，只要使用恰当，也未尝不可。而且山谷诗中这种作法并不太多，甚至不比苏东坡多。当然山谷诗确有缺点，喜欢避熟就生，过于深折硬涩，故意造些拗句。但他毕竟有不少凝炼而明净的作品。如果说东坡诗里蕴涵着道家意味，山谷则有更多的禅学。禅家修养使山谷能冷静地对待艰险和危难，并且体现在诗里，使激越的感情出以深婉平和。但有时掩抑过甚，变得枯淡索然，可谓得失参半。

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称为“苏门四学士”，加上陈师道，陈造称之为“秦黄晁张陈，众星罗霜天”。他们都游于苏

门，诗作却各有自己的风格。出于一门，并不定于一尊。秦观是北宋可与柳永比肩的婉约派词人。其诗大多清新婉丽。由于元遗山《论诗绝句》写过“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如此秦诗柔弱，是“女郎诗”，成了对秦少游的定评。是女郎诗也没有什么不好，只是用两句话来定终身，未免以点概面，是一种不科学的批评。如果换两句诗，比如“正是山川秋入梦，可堪风雨夜连天”，他何尝柔弱，何尝像娇娆女郎呢？少游不仅写了不少健朗的作品，甚至还写了一组相当硬涩的《田家诗》。他是苏门成就颇大的诗人。晁补之也是词人，其诗作自认为有如鸡肋，食之无肉，弃之可惜，因名为《鸡肋集》。我们可不能因他自己这样认为就真以为他非常之差，其实他的诗作亦颇可观。“胸中正可吞云梦，盏里何妨对圣贤。有意清秋入衡霍，为君无尽写江天”，这样的诗还是很有气势的。张耒诗清新秀丽，读他的好诗，真有明丽如春的感觉，绝句尤称作手，王安石苏东坡之外，又自别开生面。但集中有不少诗过于草率。陈师道在当时得重名，后人常把他同黄庭坚连在一起，其实两公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苏门的诗人大多挥洒自如，陈师道却是一位苦吟诗人，黄山谷称之为“闭门觅句陈无己”，那种搜索枯肠“觅”出来的作品，他作得艰难，别人读起来也吃力。他是忠厚人，因之诗也朴实，感情诚挚。但好诗不是很多。读他的集子令人沮丧，不只是语言干涩，更在于境界不高。诗必须注重美质，即使忧伤愤激也必须高雅，嬉笑怒骂也必须高尚。后山集中叹老嗟卑的

篇章，衰疾可怜的词句，随处可见。《杨花》诗云：“后村何所恨，独处不祈怜。”写这样的句子实际上就很有点可怜。

宋哲宗元祐之初，司马光为相，前此被变质了的新派排斥贬逐的人被一一召回朝廷。苏东坡、黄山谷、秦少游、晁补之、张耒，三孔兄弟，大画家李公麟等，一时俊彦，云集京师。这是苏门的一段盛会，致使元祐成为有宋诗坛的极盛，清代同光体诗人称之为中国诗史上“三元”之一，是继唐代开元、元和之后的第三个高潮^⑩。但曾几何时，新派再次当权，元祐诸人又纷纷贬逐，从此星流云散，再未得相聚。哲宗元符三年（1100），“少游醉卧古藤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东坡道人又沉泉”；下一年，陈师道病逝于京邸；又3年，黄山谷贬死在宜州；又5年，晁补之病卒；再又4年，张耒去世，10多年间，元祐群星全部殒落。突然之间，万喙息响，诗坛寂寞。其间还发生了一场小小的“文化大革命”：蔡京何执中为相，凡元祐党人一概废斥，官吏升迁还需申报是否与元祐党人有关。他们对元祐诗人如此憎恨，甚至从此不准士人读史作诗。何执中还制为条令：“诸士庶传习诗赋者杖一百！”^⑪谢谢二位相公，他们的科条，恰好给我为宋诗于此处分期划了一条鸿沟。

三、江西派与南渡前后的诗坛

南渡前后30年间，是北宋诗风向南宋转化的时期。这个时期从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陈与义中进士开始——下一年元祐诗星最后一颗张耒去世，成为两个时期交接的标志

——中经靖康巨变，宋室南迁，到绍兴十三年（1143）陆游赴临安应试为止。之所以把北宋之末南宋之初划为一段，是因为活动于其间的大体上是一代人，而以陈与义为代表。前乎此，为北宋元祐诗人的世界；后乎此，为南宋三大诗人的时代。这期间重大的文学现象是江西派的膨胀和由国家巨变引发诗风的巨变。

黄山谷本人并没有宣称什么派，只是由于追随他的人多，他逝世之后逐渐成了气候，后来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以黄山谷为祖，列陈师道以下二十五人，“以为法嗣，谓其源流皆出豫章也。”可知宗派成员是吕本中指派的，黄山谷和他的诗友陈师道等并不知情。后来人们又将吕本中本人补入。到了元初，方回又将陈与义和曾几补上，并倡“一祖三宗”之说，以杜甫为祖，黄山谷、陈师道、陈与义为宗^②。时黄山谷陈师道已过世一百五十多年。吕本中掲出一个江西派，当然不是毫无根据，当时效法黄山谷成为风气，宗派图中多数人受山谷影响是事实，所以被南宋人所承认。

江西派的出现并不是值得嘉许的事。北宋后期，苏东坡的影响应该说比黄山谷还大。大概因为天马行空的东坡诗，超逸绝尘，人们瞠乎其後，难以追踪，所以崇拜者虽多，却没有成为什么派。山谷的诗，讲究篇章的结构，句子的变化，要求“无一字无来处”，看起来很难，实际上却比较有法可循，所以追随效法的人越来越多，以至形成风气。但是追随者没有祖师的工力，片面地从形式上追求，恰好得到他的糟粕而遗其精髓，以致每下愈况，到后来乃流于枯干晦涩，

甚至剽窃拼凑。试看江西派中并没有成就可观的诗人，就可知这种仿效之无益。其中陈师道晁冲之本来就不该派入，韩驹徐俯当时就表示反对，而陈与义曾儿的参加连原来宗派的排榜者吕本中都不知道。而除他们之外就没有什么有斤两的人了，有些成员甚至连一首诗也没有留传下来。然而江西派的诗风竟弥漫于北宋后期，绵延至于南宋，甚至陆放翁范成大杨万里都受其影响，再经元代方回等人鼓吹，余波所及远至明清。

江西派的诗风，受到当时和后世许多人的反对，派内的人晚年也表示异议。金王若虚抨击江西派不遗余力，连黄山谷也一并否定，有道是“已觉祖师低一着，纷纷后法是何人！”他的批评有失公允，江西派的出现，黄山谷有关联而无责任，正如方回连杜甫也拉来作祖，杜少陵自没有任何过失。山谷本人是不该否定的。元遗山诗云：“论诗宁下涪翁拜，不作江西社里人。”这种态度就较为公正^⑧。

一场天崩地塌的变故，惊破了统治者的迷梦：靖康二年（1127）金人攻破汴京，掳徽钦二帝北去，整个中原相继沦陷，广大人民流离失所，“擘钗破镜分飞”，无数个家庭都无情地破碎。诗人们不管是江西派还是非江西派，都不可能悠闲地吟咏了，许多人随着逃难的人群纷纷南下。时代的屯蹇，往往对文艺激发起新的活力。在国破家亡流离迁徙的途中，诗人们拿起笔来，无论是凄楚悲吟，还是慷慨奋呼，都不可能去讲求什么“无一字无来处”，或者是什么“脱胎换骨”之类。原本成绩平平的江藻王庭珪，而今都写出了动人

的篇章。与江西派确有瓜葛的吕本中曾几，也都摆脱了束缚，越上了新的台阶。女词人李清照如今伶仃孤苦，流落天涯，她的词笔也告别了“中州盛日”的旖旎春情，谱出了哀婉凄凉的悲歌，也写出了若干沉郁苍浪的诗句。被迫流寓北方的朱弁，用沉痛的诗章，抒写了他思怀故国的幽愤。理学家刘子翥也用清新流丽的绝句，写下了靖康之难那一页亡国痛史。世积乱离，风衰俗怨，诗苑词坛无不经历了一番血与火的洗礼。在这济济跼跼的诗人群体中，成就最为辉煌的是也曾被后人推入江西派的陈与义。

陈简斋是在元祐群星沉寂之后登上诗坛的。他以《墨梅》绝句为徽宗所赏识而一鸣惊人，中断了蔡京何执中发动的那场短暂的“文化大革命”。他早期的诗确有黄山谷的影响，就以《墨梅》诗而论，造语也比较拗折。在政和宣和的十几年间，他的成绩并不突出。靖康之难后，陈与义告别了黄山谷而直奔杜甫。他避地襄汉，辗转湖湘，眼看着国家不可收拾，人民流离失所，自己也在丧乱中奔亡。飘泊江湖，颠连道路，望中城阙，客里风霜，这时的陈与义身境和心境，都和当年杜甫十分相似，他和杜诗的基调也就完全合拍。他把国家的命运，人民的遭遇，和自身无法舒展的愤懑，通通写进诗里，风格苍凉沉郁，寄托遥深。他的好诗都是乱离中的产物。刘克庄《后村诗话》云：“元祐后诗人迭起，要之不出苏黄二体而已。及简斋始以老杜为师。建炎间避地湖峤，行万里路，诗益奇壮，造次不忘忧爱，以简严扫繁缚，以雄浑代尖巧，第其品格，故当在诸家之上。”这一段

话，对陈简斋作了准确的评价。

四、陆范杨三足鼎立，南宋诗的高潮

南宋诗歌的高潮，在陆游范成大杨万里三大诗人创作的时代，自陆游于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临安应试，到诗人于宋宁宗嘉定三年（1210）去世，近70年。

陆游生于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范成大生于钦宗靖康元年（1126），杨万里生于靖康二年（1127），像是相约好了结伴而来，三者之间都以一岁之差形成三个阶梯，那顺序恰好是他们在诗史上的地位。当他们呱呱堕地之日起，面对的就是这个灾难深重的世界，在襁褓中听到的就是笳鼓的悲鸣，人民的哀号和前辈们忠义的愤呼。三大诗人在年青时都经历过刻苦的学习，具有深厚的根底。有趣的是他们都和江西派粘点儿关系，陆游曾向曾几学诗，杨万里说他曾学过“江西诸君子”，而范成大中年的许多诗作一直留有江西的痕迹。后来他们又都能脱出江西派的羁绊，在广泛学习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风格。他们都由进士出身（尽管陆游受秦桧的阻挠，后来是由孝宗赐的）；又基本上都在地方官路上奔波，遍览了祖国的山河，也经受尽道途的困顿，晚年又都有一段乡村闲居的生活。这些经历，使他们懂得了在社会和大自然中锻炼才华和进行创作的诗家三昧。陆放翁“工夫在诗外”的名言，何尝不是他们共同的体会。三位诗人是知心好友，始终相互推崇，互相鼓励，文人相轻在他们之间是不存在的。同时他们又筑起各自的营垒，树起各自的大旗，以迥